

明代經濟史述論叢稿

秦佩珩 著



# 明代經濟史述論叢初稿

秦佩石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9·鄭州

##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討論有关明朝的社会經濟問題的論文十二篇。是作者較長期研究明代經濟史的积累手稿。作者研究明代經濟史是从地方志与明实录着手的，因此，能有較丰富的材料去闡述自己对明代資本主义萌芽問題的看法。而這些文章在付印前作者又作了一些新的补充，可供學習研究明史的同志参考。

## 明代經濟史述論叢初稿

秦佩珩 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地方国营郑州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書店發行

\*

豫总書号：1169

787×1092耗1/32·5 $\frac{3}{8}$ 印張·130,000字

1959年11月第1版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89册

統一書号：11105·9

定价(9)0.58元

## 自序

明代經濟史，尚須大加研究。我是从地方志和明实录着手習作的。这本小冊子里的十二篇短文，大都是我在1952年前后写成的。年来，因体多病，略事修改，提出来向同志們請教。我初步从旧書籍中檢出来的这几篇聊备刪削的短論，命之曰稿者，盖不敢視為定本，仅作为参考資料之意云尔。蛇迹虫草，行供复瓿，黃口童牛，頗悲稚陋：

1953年，秋尽，岳麓山。

秦佩珩

# 目 次

自序

|                  |         |
|------------------|---------|
| 明代城市經濟論略         | ( 1 )   |
| 明代戶口問題研究         | ( 16 )  |
| 明代馬市開置小史         | ( 42 )  |
| 明代手工業問題的考察       | ( 47 )  |
| 明代制酒述要           | ( 76 )  |
| 明代陶瓷業底發展及其世界影响   | ( 83 )  |
| 明代的制茶業及其与国际市場的关系 | ( 103 ) |
| 試述明代財政問題彙論一條鞭法   | ( 110 ) |
| 明代朝貢貿易初探         | ( 124 ) |
| 明代物價輯錄           | ( 142 ) |
| 关于明代的礦業及其他       | ( 148 ) |
| 明代云南肥幣考釋         | ( 164 ) |
| 后記               | ( 169 ) |

# 明代城市經濟論略

## 一、明代城市經濟發展概述

我們研究城市經濟，首先要知道：城市在历史过程中，是依其所由發展的社会經濟形态逐漸改变着它的面貌的。

这也就是說：城市的发展規模，和在国家領土上的分布情形，对于各种社会經濟形态來說，都是不同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一切都受着生产力發展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質的約制。

因此，我們研究明代的社会經濟，就有首先了解其城市經濟發展的必要。

明代的城市經濟，比之前代，是有着更大的發展的。

但，必須指出：这种發展，是和生产力在封建制度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取得密切关联的。自十四世紀六十年代，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經過近一百年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推翻了元朝政权。此后，中国人民便摆脱了蒙古部族的殘酷統治，同时人民的斗争也推动了封建朱明皇朝所施行的一系列的恢复及發展生产的措施，而使当时的經濟在唐宋以来原有的水平上繼續向前發展。特别是，自明中叶以后，城市經濟發生着更剧烈的变化，市民階層在逐漸开始成長和抬头。

在明代后期，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已經出現，并且在某些城市里已經具有相当可觀的規模。由于新型生产方式的产生，就必然促使城市經濟有着更大的發展。

从城市的規模来看：在十五世紀初叶，包括北京、南京在內，全国有三十三個較大的商業手工業城市①。当时在这些城市都設有稅收机

① 这三十三個較大的商業城市是：順天、應天、鎮江、淮安、苏州、松江、常州、揚州、儀征、杭州、嘉興、湖州、福州、建寧、武昌、荊州、南昌、吉安、臨江、清江、廣州、開封、濟南、濟寧、德州、臨濤、桂林、太原、平陽、蒲州、成都、重慶、廬州。

構，称为“鈔关”①；而自明中叶以后，淮安、岳陽、九江、西安、潯墅、遵化、蕪湖、泉州、宁波、浮梁、廉州、郑州、沙市、天津、閩中、保定、河間、宣化、潯安、洛陽、鉛山、大同、衡陽、益都等二十四个城市也逐漸地發展起来。

由于城市規模的大加扩充，手工業也就跟着繁荣起来。特别是江南的苏、松、常三郡，所謂“市浮于农，女胜于質”②。我們仅就松江府城为例，当时松江手工業的發展已十分可觀③。

这种發展就必然引起城市的扩建与增筑。在明代，如南京、北京、广州、福州等地，由于人口的增加，工商業的發展，城市的扩建与增筑問題就被提到日程上来。特别是沿海一帶的城市。試再以松江为例，自嘉靖以后，松江郡治（附郭有华亭、婁县）东西二門，为商賈集散之地，在此已形成为各地手工業者集中的中心，而且是棉紡織品的加工城市。这样，城市就一天天扩展起来。同时，由于封建貴族的奢侈生活，所謂“歌楼酒肆賈街繁华”④，更由于在松江拥有成千的建筑工人，所謂

---

①明書卷八一，鈔法及卷八三，商稅。

②方孔炤：全边略記，卷十一，腹里略。

③关于此点，万历时，范濂的云間据目抄，已描写得非常生动。如云：

“瓦楞駢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員始戴，至二十年外，則富民用之，然亦仅見一二，价甚騰貴。”又云：“万历以来，不論貧富，皆用駢，价亦甚賤，有四五錢、七八錢者。又有期素密結等名，而安庆、長于修結者，紛紛投入吾松矣。”范濂也描写到鞋袜等的制造。“郡中絕無鞋店与蒲鞋店，万历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漸輕俏精美，遂广設諸肆于郡治东。……宕口蒲鞋，……自宜兴史姓客于松，以黄草結宕口鞋甚精，……謂之史大蒲鞋，此后宜兴業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松江旧無暑袜店，暑月間穿跣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單暑袜，極輕美，远方爭来購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以上見范濂，云間据目抄，卷二，紀風俗）

④松江府志摘要“屑玉叢談本”頁二十二下。

“匠役皆以千計，听金鼓作息”①，此外还有一些消費性的商店和艺人（当时称戏子）②；因此，到万历（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間，松江的人口增長極大，这样城市的扩建与增筑，就成为当时最迫切的社会要求。就正如范濂所謂“有識之士，必以筑新城于西郊为首务。”③

从城市人口来看：無論是政治中心的兩京，或是一些工商業發達的市鎮，人口都在逐漸的增加。以南京为例，因商業發達，于是居民“薪粢而下，百物皆仰給于貿易”④。这就說明了城市居民对工商業的依賴。特別自万历以后南京人口大增，謝肇淛所謂“金陵街道極寬廣，虽九軌

①范濂：云間据目抄卷五：“文貞徐公当国，撫按奏請改济农倉，为元輔三第，大工之日，匠役皆以千計，听金鼓作息。”

②范濂，云間据目抄云：“华亭熟酒，甲于他郡，間用貢酒、金华酒。隆庆时有苏人胡沙汀者，携三白酒，客于松，頗为縉紳所尚，故苏酒始得名。年来小民之家，皆尚三白，而三白，又尚梅花者、蘭花者，郡中始有苏州酒店，且兼卖惠山泉，自是金华酒与弋陽戏称兩厭矣。戏子在嘉隆交会时，有弋陽人入郡为戏，一时翕然崇尚，弋陽人遂有家于松者，其后漸覺丑惡，弋陽人复学为太平腔、海鹽腔以求佳。而听者愈覺惡俗，故万历四、五年（一五七六——一五七七）来遂屏迹，仍尚土戏。近来上海潘方伯，从吳門購戏子，頗雅丽，而华亭顧正心、陈大廷繼之，松人又爭尚苏州戏，故苏人鬻身学戏者甚众。且有女旦、女生，插班射利，而本地戏子十無二三矣。亦一異数。（參看云間据目抄卷二，記風俗）。

③云間据目抄卷五云：“范叔子曰：松江保障之法，莫急于筑新城。盖隆万以来，生齿浩繁，居民稠密，幸享承平，足称富庶，倘兵燹陡發，驅民入城，無論乡鎮，即四郊外十里許，計男妇不下二十余万矣。窃恐郡城方不踰九里，容蓄几何？澤必竭流，薪必燎骨，糧必塞道，更加疫癘暑雨，則露宿者号呼动地，有万万不可胜道之苦。况昔年人民，犹知安分守法，今之惡少，凶狡百出，安能坐縛手足，久踞飢餓乎！此势之必然，而城小人众，亦兵家之大忌也。故有識之士，必以筑新城于西郊为首务。

④顧起元：客座贅語。

可容，近來生齒漸繁，居民日密，稍稍侵官道以為廛肆”。①（珣按洪武時應天府戶一十六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口一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二十。見明會要卷五十，民政一，戶口。僅南京城市民詳細戶口待考）。再以新興的一些集鎮而言，例如烏青鎮，志稱“烏鎮與桐乡之青鎮東西相望，升平既久，戶口日繁，十里以內，居民相接，烟火萬家”②。這些市鎮“地大戶繁，百工之屬無所不備”③，且“名為鎮而實具郡邑城郭之勢”④。

由於人口的增加，消費品也就日漸增多。單舉松江而言，人們的生活標準，也在逐漸提高。萬曆時，范濂的《雲間據目抄》已清楚地畫出了這個輪廓：“設席用攢盒，始於隆慶，濫于萬曆，……郡城內外，始有製攢盒店。……細木家伙，如書桌、禪椅之類，余少年曾不一見，……隆萬以來，雖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而微之小木匠，爭列肆于郡治中，既嫁裝什器，俱屬之矣。”⑤

從城市中的行會組織來看：隨着工商業的發展，各地方出現各種行會，如手工業的行會中，北京的銅鐵業分為西行與東行，還有匠頭擔任對外包攬工作，独占銅鐵業⑥。荊州沙市在明末極盛，“列巷九十九條，每行占一巷。舟車輻湊，煩盛甲字內”⑦。杭州的手工業行會組織有着獨自的行規、假日，而且“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⑧。這是一種具有基爾特組織形式的工商業組合。這種行會組織在城市中底產生，乃是商品生產發展底結果。但同時必須明確，行會只是在商品生產還發展不夠，手工業為狹小的市場生產，而手工業者又是自己商品底售賣者的時候，才能够控制和限制競爭。

①謝肇淛：五雜俎，卷三，地部。

②烏青鎮志，卷之二，形勢，頁一。

③烏青鎮志，卷之二，形勢，頁一。

④烏青鎮志，卷之二，形勢，頁一。

⑤范濂：雲間據目抄，卷二，紀風俗。

⑥工部廠庫須知，卷四。

⑦劉獻廷：廣陽雜記，卷第四，頁二〇〇。

⑧田汝成：西湖游覽志，卷二〇。

从城市商業的規模来看：明代都市商業繁盛，規模超越前代，如顧起元描写南京商業的繁華情形，“自大中桥而西，由淮浦桥达三山街，斗門桥以西至三山門，又北自倉巷至治城，轉而东至內桥中正街而止，其物力客多主少，市魁鬪儉，千百嘈雜其中。”<sup>①</sup>当时南京許多商店的門上，都挂有極精致的帘幕。至于北京，根据刘侗的記載，以庙市为中心的市場，規模也極龐大，其开市日期，每月朔望念五日，列肆三里之長，当时买卖的物品，凡古今圖籍，商周彝鼎，秦汉匱鏡，唐宋書画，無不应有尽有。至于“珠宝、象、玉、珍、錯、綾錦之曰滇、粵、閩、楚、吳、越者集”<sup>②</sup>。其他的商品，也尽皆琳琅滿目；美不胜收。

同时，由于商業的繁荣，商稅的收入也就必然跟随着增加。宣德四年（一四二九）于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旧凡五倍。这还是在明代初年的事情，到了中叶以后，万历时，“东則山西，西則四川，稅皆万計”，“即大藩如河南，亦六万余。秦肥瘠視三省迥殊，而稅額多至十万”<sup>③</sup>。在崇禎初年，關稅只每兩增一錢，仅“通漕八关”即“增五万兩”。这在明以前（例如宋元）是沒有这样多的。

最后从城市中手工業的情况来看：明代城市中手工業繼承了兩宋的基础，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而且具备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在明代的手工業中，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也有了極显著的变化，其在当时生产关系上也有些特征。

毋庸置疑：由于商業和手工業的發達，明代商品經濟市場更形扩大，在某些方面，自然經濟已逐漸开始退色。同时，必須指出，在一些城市工商業經濟的突飞冲击之下，江南有不少的市鎮已开始逐漸脱离农业生产，而变为工商業的根据地，并拥有大量的人口<sup>④</sup>。这一情况，特

① 顧起元：客座贅語。

② 刘侗：帝京景物略（說郭本）卷四，城隍庙市。

③ 明会要，卷五十七，食貨五，頁一〇八六及一〇八七。

④ 如筹海圖編卷十二，筑城堡云：“付使茅坤云：（中略）至于市鎮，如湖归安之双湖埭市，烏程之烏鎮南潯，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亦不下中州郡县之饒者。”

別是在明嘉靖以後，更顯著地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如烏青鎮的發展①，以及震澤各市鎮的發展②，都是一些極典型的例子。這也說明，城市直接發展對農村社會生活發生着重大的影響。

自然，所謂城市的發展對農村社會生活有重大的影響，也就是說，城市的發展愈大，對封建農村的依賴也愈大，農村經濟也逐漸被卷入市場的周轉中。農民也愈益和地方的市場發生關係。農村人口也就容易向城鎮集中，而形成某些特點的手工業中心。如雙林、菱湖、烏鎮、南潯都是絲織業的中心。又如蠶市則為制蠶業的中心等等。諸如此類性質的市鎮，在常州和蘇州以及其他各地，也都有迅速的發展，而此特點，以嘉靖前後為一樞紐期。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市鎮已不是單純的恬靜的農

①茅坤分畧紀事本末序云：“烏戍鎗錢塘姑蘇之脊所，當商賈之航閭，粵而漕江淮者，亦咽喉于此。人烟輻輳，環帶數千家。”又烏青鎮志卷之二，形勢，賈二云：“烏青當水陸之會，巨麗甲他鎮，市遠廣袤十八里，列置四門，虽通甯南昌澄江諸門旧址蕪沒。而東之朝宗，屈令犹相沿不改，名為鎮而實其郡邑城郭之勢。蘇杭嘉湖，六通四辟，輻輳賈舶，無間道可他适。則兩鎮显然為南浙之門戶已。……兩鎮之外，大河四迎，近鎮則水勢屈蟠，而且村落隣次，弗覺都屋，為之互蔽環遮，阡陌隔分，林木蓊郁，居一里之外，邇不知靈秀結聚于其中也。”

②震澤縣志卷四，鎮市村。“震澤在十都，地濱太湖，故名。去縣沿西南九十里（史志作八十里），元時村市蕭條，居民數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間倍之，而又過焉。……平望鎮在二十四都，去縣治東南四十七里。（中略）明初，居民千百家，百貨貿易如小邑，然自宏治迄今，居民日增，貨物益備，而米及豆麥尤多，千艘萬舸，遠近畢集，俗以小楓橋稱之。雙楊市在十一都，去縣治西南五十里，明初居民止數十家，以村名，嘉靖間始稱為市，居民至三百余家，嘉靖間倍之，貨物頗多，始稱為市。（中略）檀丘市在十八都，去縣治西南五十里，明成化中居民四五十家，多以鐵冶為業，至嘉靖間數倍于昔，凡銅鐵木坊樂器諸工皆備。（中略）梅堰市在十九都，去縣治西南六十五里，明初以村名，嘉靖間居民五百余家，自成市井，乃稱為市。”（見乾隆陳和志修本）

村,而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新型的小工商業城市。这种典型的村鎮在晚明小說中介紹了很多<sup>①</sup>。这些村鎮的居民其生活已大受城市的影响,而愈益和城市經濟發生血肉的联系。这就为“貨幣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条件。当然,这种發展就当时的实际情形来看,其發展也还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进展得較快,有些地方,就比較显得迟緩些。所謂“旁邑皆阻格不行”<sup>②</sup>。这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妨碍了“一条鞭法”的推行。

## 二、明代城市經濟發達的原因

明代城市經濟的發達是繼承了以前時期的發展,但同时也是明代生產發展的直接結果。明代城市經濟較之以前時期更为發達,如在唐代時,大城市只有長安、揚州、洛陽等地,到了宋代,則發展有廣州、泉州、溫州、明州、杭州、澈浦、秀州諸地,但到了明代則發達的城市就開始遍于各地(見上節)了。明代城市經濟的發展,約可分为下列几种原因。

(一)由于農業的發展,农产品的銷售需要市場,推动了城市經濟的發展。明自統一以后,一方面是獎勵墾荒并移殖东南过剩的人口于淮河流域,也就是对于土地与人口分布疏密的調整,另一方面,即为力業

---

①例如嘉兴的王江涇和吳江的盛澤鎮都是。天然癡叟:石点头,第四卷,瞿鳳奴清怨死蓋:“嘉兴府去城三十里外,有个村鎮,喚做王江涇,这个地方北通苏松常鎮,南通杭紹金衢,宁台溫处,西南即福建兩广,南北往来,無不从此經過;近鎮村坊,都种桑养蚕为業,四方商賈,俱至此收貨,所以鎮上做买卖的挨挤不开,十分熱鬧。”又馮夢龍:醒世恆言,第十八卷,施潤澤灘頭遇友:“苏州府吳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鎮,地名盛澤,鎮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業。男女勤謹,絡緯机杼之声,通宵徹夜。即市上兩岸綵絲牙行,約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来收买的,蜂攪蟻集,挨挤不开。……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鎮处最盛。”

②熊元,安邱县志〔万历刊本〕卷八,頁五五,賦役考第七。

的調整，如“計口給田”，“驗丁撥付”，“若有余力，听其开垦”等等措施，这些办法，或多或少都含有限制兼并的意味在內。目的使“力業相称”，頗含有北魏均田制的意味。同时，也必須指出除以上兩点外，也因統治階級对于农民的讓步，施行垦地免租獎勵的办法，就使生产力获得很大程度的發展，依据通考，当时荒地的开垦大为增加。自洪武三年后“每岁中書省奏天下垦田数者亩以千計，多者二十余万。”到了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总計天下垦田，共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頃有奇。因土地的开辟，生产的增加，城市的交易行为也跟着發展起来，在洪武时令三山門外塌房停积商貨，永乐中，也“会京城官店塌房，照南京三山門外塌房例，稅銀一分”①。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使朱明皇朝的財政愈趋于巩固。更重要的是：朱明建国后，曾大力推行中央集权政策，要推行这样一个政策必須有其条件，而要求在全国統一的基础上，有一个發展社会經濟的有利的和平的条件和环境，應該是推行中央集权政策的条件之一。当时，南京和北京，需要乡村粮食的供应特別迫切，在“兩浙賦稅，漕运京师”的命令下，宣德时，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于淮安倉，苏、松、宁、池、廬、安、广德民运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倉，应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民运二百二十石于临清倉②。除去这大批的粮食外，其他南方各地的农产品，也大量地运銷于城市之內。

（二）工場手工業以城市为其集中地：由于工場手工業的發达就使原有城市更加繁荣，有的發展成为新的大城市。在各城市就出現了許多手工業工場。如杭州、苏州的絲織業工場，在这些工場里，集中着大量的“浮食奇民，朝不謀夕；得業則生，失業則死”的工人③。他們依賴“日佣为錢二百緡”的工資来維持生活。如景德鎮便是制瓷業的手工工

---

①明会要：卷五十七，食貨五，塌房。

②明会要：卷五十六，食貨四，漕运。

③明神宗实录卷三六，頁六。

場的中心，这里据说曾經到达將数十万的人口①。由于工場手工業有了  
一定程度的發展，在社会分工逐步扩大和城市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条件下，  
許多商品就不得不追尋更廣闊的銷路。有的不独銷售于国内，还運  
銷到国外市場上去。如大家所知，松江的棉布，不独“衣被天下”②而  
且还銷到日本去，姚叔祥所謂“松江之棉布，尤为彼国（日本）所  
重。”③又如大家所知，广东以产蔗糖著名，其所产品，不独行銷于  
閩、广及国内其他各地，而且也打开了国际市場。正如屈大均所說，其  
“最白者，以日曝之，細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指国外），曰洋糖，  
次白者售于天下（指国内）④。由此看来，当时以城市为中心的手工业  
場，其为广大市場而生产的情况，已十分明显，如蘇州的竹簞，建宁的  
茶，宣州的紙，宁波的綉縐，兩淮的鹽，都通过商人運銷各地市場⑤。

不特如此，由于商品銷售范围的扩大，必然又反轉来刺激生产，这  
样，就会使一些銷路較盛，生产条件較佳的商品底生产，逐步形成專門化  
的地区，这就逐漸形成了許多手工業專門地区。如松江便是棉紡織業專  
門地区；湖州便是蚕絲業專門地区；遵化和佛山便是冶鉄業專門地区；  
閩中和潞州便是絲織業專門地区等等……这些專門地区的所以形成，是  
和当时手工業工場的發展分不开的。

### 三、明代城市經濟的特征

如上所述，明代城市經濟，虽已如此發达，已走向封建社会末期。  
但仍然具有一些封建性質。这表現在以下各个方面。

---

①明清史料甲編第九二三頁：“總計臨城周圍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  
無論南北財貨，即紳士、商民，近百万口。”此人口数字，容有誤，  
待考。

②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松江府部，風俗考。

③姚叔祥見只編。

④屈大均，广东新語卷二七。

⑤明会要，卷五十七，食貨五，土貢。

(一)明代城市經濟的封建特征，首先表現在官僚資本對城市經濟的壟斷與封建的朱明政府對工商業的橫征暴斂上面。如隆萬時人張瀚就是出身於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所謂“余嘗宦游四方，得習聞商賈盈縮”①。他既是一個官僚（吏部尚書），也是一個資本主（名富至數萬金）②。又如大官僚嚴嵩，抄家時“黃金可三萬兩，白金二萬兩”③。他既是一個官僚（禮部侍郎）也是一個資本主（追其受寄，金錢垂二十年不盡）④。這些人壟斷着城市中的工商業。王世貞（弇州）曾記明中葉中國的一些官僚地主階級，頗可說明其操縱財富的情形⑤。這裡所舉出的有官僚、有地主、有富戶、有商人、有宗室、有軍閥、有土司、有太監。其中有青一色屬於商人的身份⑥；但也有很多是官僚資本主。

其次明代的城市經濟，也受到朱明封建政權的橫征暴斂。如萬曆四十四年，陝西巡按龍遇奇言：“秦民包稅，其苦有三”一曰包賠無著之苦：天下稅課，例屬商賈。若秦則三面臨邊，商賈罕至，向來稅額皆派之丁畝及津梁、陶穴、筑佣之輩。今凶荒死徙，村里為墟，即向來稅科無從矣。一曰稅額獨多之苦：秦邊地也，瘠土地。遠在江南腹里者勿

---

①張瀚：“松窗夢語”卷四。

②張瀚：“松窗夢語”，卷七，異聞記。

③參看天水冰山錄及明史嚴本傳。

④同上。

⑤王世貞弇州史料後集卷三十六云：“嚴世蕃積資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其後四高會矣，而乾沒不止，嘗與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屈首等者，凡十七家，虽深陽史恭甫最有聲，亦僅得二等之首。所謂十七家者，已（嚴世蕃自指）與蜀王、黔公、太監黃忠、黃錦及成公、魏公、隨都督炳，又京師有張二錦衣者，太監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與土官貴州安宣慰。積資滿五十萬以上，方居首等。前是無錫有鄭望者將百萬，安國者過五十萬。今吳興董尚書家過百萬，嘉興項氏將百萬，項之金銀古玩實勝董，田宅典庫資產不如耳。大梁馮寶、張宏家資皆直二百萬以上，武清李侯當亦過百萬矣。

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無錫鄭望、安國，都屬於商人的身份。

間，即与秦連界者，东則山西，西則四川，稅皆万計。即大藩如河南，亦六万余。秦肥瘠視三省迥殊，而稅額多至十万。即蒙恩減，而已減之額，尚浮于三省未減之額矣。一曰，牽誤邊餉之苦：民止此財，官司既督以賠稅，自不能并力以輸邊。計秦民十八年已輸過一百五十万，而坐連邊餉則已二百四万。足此誤彼，明驗不爽。此包稅所以不可不罢也。”①明代各種工商業稅，名目極多。自隆庆以來“凡橋梁、道路、天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虽累詔察革不能去”②。在織造業中，这种例子非常多。如湖北、黃陂的葛布，万州的藤器，也常常受到封建統治者的勒索和壓榨以至于破產。当时就有陶允宜作了一首黃陂葛詩：“楚人种葛不种麻，男采女績爭紛拏。皎如白紵輕如紗，進之內宮傳相夸，价值減少尺幅加，織者十家逃九家。”③織者十逃其九，这是官吏壓迫手工業者的很好的寫照。万州府志也說：“正德中，（万）州人織藤器。……总兵派索無厭，一黎女以急織不成過限，其父被譴，遂憤縊死，此技遂絕，戒不复習”。④这段故事，生动地描述了封建統治者对手工業的無情摧殘。

（二）同样的性質也表現在城市工商業的被行会所把持：不难見到，“牙人”和“牙行”在明代的工商業史上，仍占有一定的地位。

就前者而言，牙人的充當，隨着工商業的發達，这种專門職業的人便大大增多了。工商業發達的地方，往往有“市魁鬪儉千百嘈哄其中”⑤。如在揚州“俗習四民，自士农工賈而外，惟牙儉最多，俗云經紀。皆官為給帖。凡魚鹽豆谷，覓車船雇廐馬之類，非經紀關說則不得行，常值之外，另与用錢。揚州瓜儀經紀不可万数”⑥。明中叶以後，不独“富

①明會要，卷五十七，食貨五。

②明會要，卷五十七，食貨五。

③元明事類彙編，卷二四，衣冠門引。并見黃陂縣志卷之一頁三十物產類。

④見万州府志。

⑤余繼登，客座贅語卷一。

⑥楊洵揚州府志（明刊本）卷二十五頁風物志。

者習為商賈牙儉”<sup>①</sup>，就是一般士人也有依賴牙儉為生的。明末的大思想家唐甄，就从知縣一變而為牙人<sup>②</sup>。但這些牙人多為經商破產而變為牙人的，照唐甄自己的話來說，便是：“昔者盡露其田，使原（其子）賈經，少有利焉。原不肖（不善經商），盡亡其資，又使為牙，以主經客。”<sup>③</sup>這種牙人，與官府以及封建性的傳統有很大關係。他們的充任和惩治，都取得了法律上的承認。

必須指出：明代的牙人有“官牙”與“私牙”之分。“官牙”之設，乃是商、牙與官府在稅收鬥爭上的產物，同時也是朱明政權加強其對於商民剝削的政策體現。“官牙”如所謂近於“牙店”性質的“皇店”，在很多場合下即以皇帝的招牌出現，排擠掉“私牙”的利益，而對於商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再就私牙而言，他們在工商業中仍起着一定的作用。如在當時的武昌，“舟車絡驛，熙來攘往，”在這號稱極盛的都市里，直到清嘉慶時，尚不能擺脫行戶的束縛<sup>④</sup>。外地的商人多通過牙人向本地收買貨物。所謂“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爭布商如對壘”<sup>⑤</sup>。同時，這些牙人，除介紹交易外，還直接為官府征收商稅，即明會典所謂：“務令牙人，盡數開報收稅，仍將收過數目，送付監收御史主事稽考。”<sup>⑥</sup>這就更加大了牙人的作用。當然，這些“私牙”也必要向官府進行登記，

①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十一冊清河志。

②唐甄潛書上籍上恆悅（古籍出版社本第一二四頁）。

③唐甄潛書上籍上恆悅。

④江夏縣志，卷五，頁三七，風俗志十。“金口鎮來船到岸，向不棧行，……嘉慶年間，行戶籍口差徭，變更旧法。”

⑤叶夢珠，閩世編，卷七。

⑥明會典，卷三七。